

张 军 主编

# 经济发展与 产业升级： 东亚与中国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East Asia and China

 人 民 出 版 社

张 军 主编

# 经济发展与 产业升级： 东亚与中国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East Asia and China

 人 民 出 版 社

策划编辑:崔继新  
责任编辑:孔欢  
版式设计:东昌文化  
责任校对:夏玉婵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东亚与中国/张军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5  
ISBN 978-7-01-020761-2

I. ①经… II. ①张… III. ①经济发展-研究-中国②经济发展-研究-东亚  
IV. ①F124②F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81774号

## 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东亚与中国

JINGJI FAZHAN YU CHANYE SHENGJI DONGYA YU ZHONGGUO

张军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6.5

字数:261千字

ISBN 978-7-01-020761-2 定价:48.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内容简介

2008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关于其原因的分析以及未来趋势的争论已然是全球范围的热点话题,而对中国经济增长机制的解读无疑是相关研究无法回避的。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在两个维度上的特质应该引起相关研究者的重视,第一个是产业的维度,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是中国经济继续获得持续增长动力、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另一个则是地区的维度,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巨大的发展差异为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提供了腾挪和缓冲余地。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在产业升级和发展方面的经验尤其值得中国关注和借鉴。本书稿收录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韩国李根,日本村上直树、刘德强,中国台湾瞿宛文、刘孟俊等专家学者的 9 篇论文,分别从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的产业升级经验,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发生机制及其影响,以及产业政策设计应该遵循的一般原理等多个角度进行了论述。这既是对目前研究现状的一个总结,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展望。

## 作者简介

张军，男，1963年生。1992年在复旦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1995年间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和华盛顿州立大学（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现担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军教授是当今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学术界活跃的中国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的经济转型、结构改革和长期增长等有深厚的研究，在国内外著名经济学杂志发表了百余篇研究论文，出版专著和译著超过60种。其中在《经济研究》发表论文超过24篇。

责任编辑：崔继新 孔 欢  
封面设计：吴燕妮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推动经济发达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与政策研究”  
(批准号: 71333002) 的资助。

# 序 言

张 军\*

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关于其原因的分析以及未来趋势的争论已然是全球范围的热点话题,而对中国经济增长机制的解读无疑是相关研究无法回避的。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在两个维度上的特质应该引起相关研究者的重视:一个是产业的维度,中国经济在产业之间以及各产业内部企业之间仍然存在着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的巨大空间,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是中国经济继续获得持续增长动力、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另一个则是地区的维度,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巨大的发展差异为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提供了腾挪和缓冲余地,发展经济学中著名的“雁阵理论”几乎可以视为对此的最佳注解。而地区之间能够形成“发展雁阵”的先决条件在于东部沿海地区能够成功实现产业的升级和持续的发展,进而向中西部地区形成产业转移和外溢效应。有鉴于此,我们对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状况始终给予密切的关注和持续的研究。

2014年初,以“推动经济发达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与政策研究”为题的研究项目作为重点项目开始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大力支持。这个研究项目主要致力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产业政策的演变和产业结构变迁进行梳理和总结,对改革开放以来不同类型产业政策的作用机制和实施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估,同时结合其他国家产业升级和发展的经验教训,从国际分工和区域贸

---

\* 张军,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易的视角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机制进行深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的政策建议。

在开展项目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在产业升级和发展方面的经验尤其值得中国关注和借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些东亚经济体不仅成功避开了“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了人均GDP水平的大幅提高,而且还在诸多行业和领域内形成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领袖型企业,极大提高了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地位。当前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以及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都与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相仿,东亚经济体的发展历程无疑是距离我们最近(无论是时间、空间还是文化上)的解读样本。东亚经济体的另一个研究样本意义在于不同经济体在推动产业升级和发展的政策方面存在着共同点和一定的差异化,这当然有助于我们考察相关政策在产业升级和发展中的作用。此外,从东亚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自发的产业升级往往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而外部冲击则有可能扮演加快这个进程的“催化剂”角色。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在遭遇外部冲击和内部压力的同时,也面临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巨大机遇。如何将这种外部冲击转变为产业升级和发展的动力,东亚经验同样值得关注。

为了更好地了解东亚经济体在产业升级和发展历程中的关键事实和政策经验,2014年4月16日至18日,我们在复旦大学举行了以“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东亚与中国”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东亚多个国家和地区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结合东亚经济体在发展历程中产业升级的历史事实和政策经验,对中国的产业升级,特别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升级的发生机制和可能的政策选择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这本集子收录了参加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学者提交的10篇论文,分别从日本和中国台湾的产业升级经验,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发生机制及其影响,以及产业政策设计应该遵循的一般原理等多个角度进行了论述。集子的出版既是对本次会议研讨的一个总结,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展望。

# 目 录

序 言 .....	张 军	1
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减贫 .....	林毅夫 余森杰	1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的能力不足和产业政策:从基于贸易的 专业化到基于技术的专业化 .....	李 根	47
城市化与产业升级:日本东京郊外的发展经验 .....	村上直树	78
产业升级之路:以中国台湾地区为例 .....	瞿宛文	100
中国东部经济放缓:一种新的解释 .....	徐现祥 高元骅	121
中国台湾地区运用技术法人对提升产业聚落竞争力之 政策分析 .....	刘孟俊 吴佳勋	142
要素和需求结构调整下的中国服务业 现代化 .....	肖 文 姜建刚 周君芝	171
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集群和专业化 分工 .....	文健君 刘晓峰 唐东波 刘 芳	186
中国台湾地区工具机(机床)产业升级的个案研究与 政府政策 .....	刘孟俊 吴明泽	204
中国经济是否过了刘易斯转折点? .....	刘德强	234

# 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减贫

林毅夫 余淼杰\*

**摘要** 本文首次列举特征事实证明,自1978年以来,中国在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改革之前,由于违背比较优势,中国的工业结构虽然先进但实际上缺乏竞争力。由此,中国转为遵循比较优势(CAF)的发展战略,采取“双轨制”为陈旧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提供暂时保护,同时中国政府在提供产业甄别和方便经济结构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的成功创造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使得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的成功案例也为发展中国家开发本国经济带来了内涵丰富的启示和大有裨益的路径。

**关键词** 经济改革 产业升级 贫困

## 一、引言

自1979年中国实施经济改革以来的三十年间,中国已成功保持每年9.9%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以及每年16.3%的国际进出口贸易额增幅(林毅夫,2010)。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已在2014年跃升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sup>①</sup>。尽管中国受到

---

\*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余淼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① 包括Feenstra et al.(2011)在内的一些研究报告甚至预测,采用实际价格调整的购买力平价口径,中国已在2013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但仍在 2009 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且目前中国是举世公认最大的“世界工厂”。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也大获成功,1979 年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农业国之一,按照 1979 年汇率水平计算,当时中国的人均年收入相当于 243 美元<sup>①</sup>。这约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在短短三十余年后,2011 年中国的人均 GDP 金额猛增至 5000 美元左右;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中国已跻身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得益于大刀阔斧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从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各产业构成的变化状况可见一斑。在 1978 年,初级产品占中国 GDP 的 28.2%,农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达 35%左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第一产业在中国 GDP 中的占比已缩减至 11%,农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降至不足 3.5%。伴随着农产品所占份额持续下滑,最近三十年中国制造业出口额已显著增加,占比从 1980 年的 65%攀升至 2009 年的 96.5%左右(Yu, 2011a)。就业结构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比从 1978 年的 70.5%锐减至 2009 年的 38.1%,同期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占比从 17.3%上升至 27.8%。

自中国推行经济改革以来,产业升级也是一个显著的特征。正如随后将要探讨的,中国的产业升级呈现了四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1978 年至 1985 年),中国仍依赖生产和出口资源性商品,如石油和汽油。第二阶段(1986 年至 1995 年),中国见证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商品快速增长。第三阶段(1996 年至 2000 年),中国主要出口机电产品和运输设备;与此同时,中国也进口了数量庞大的机器设备。产业内部贸易额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主要归因于中国成功实现产业升级和加工贸易遍地开花,这让中国的比较优势与生产环节相衔接。第四阶段(2001 年起到现在),中国高科技产品(如生命科学设备)出口迅猛增长。

中国成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激发了一个问题,即中国如何从

---

<sup>①</sup>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

一个落后、封闭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开放、富有竞争力的“世界工厂”。本文将探讨中国生产结构和产业升级的历程。中国如何在过去三十年间成功实现制造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此番转型升级背后的基本驱动力是什么？此外，中国快速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在多大程度上助推了增加就业岗位和减少贫困？最后，我们可以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大获成功当中总结出哪些经验教训？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中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随之发生的减贫成效主要得益于中国采纳了一个适宜的发展战略，即中国自身诸多要素禀赋所推动的，遵循比较优势(CAF)的发展战略(林毅夫,2003,2009,2012;林毅夫等,2004)。鉴于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只要市场没有发生扭曲,众多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具有竞争力且可自力更生的。中国经济的潜在比较优势在改革开放以前遭到了遏制,因当时中国政府采纳了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而这一发展战略是与中国的比较优势相悖的,当时中国政府为了扶持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建立了一个组织完备但高度扭曲的体制。按照该体制,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由一个计划性的行政管理体制来设定,因此价格关系变得畸形。众多企业被剥夺了生产自主权且缺乏激励措施,生产效率低下。相应地,国内产业结构无法得到升级。由于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无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尽管该工业部门的投资金额巨大,但就业机会有限。最后,由于国家要求国有企业从生产环节压榨尽可能多的利润,工人们的工资薪酬被压制在一个较低水平,且农产品价格按照对农民不利的贸易条件来设定。这两方面因素导致中国民众维持在较低的生活水平,民众普遍贫困的严峻局势无法得到缓解。

在经济起飞后,中国采纳了遵循比较优势(CAF)的发展战略。该战略的两个主要方面是,不仅采用双轨制改革对传统的和古老的诸多行业提供暂时性的保护和补贴,而且根据中国的要素禀赋所推动的比较优势,鼓励发展与自身比较优势相匹配的、能自力更生的新兴行业。包括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对外贸易和汇率改革在内的双轨制改革基本上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在所有改革的初始阶段,都允许存在双轨制,即一个价格体系由中国政府主

导,另一个价格体系面向市场。两条轨道随后逐步融合交汇,并统一为单一的市场轨道。与之类似,为了避免休克式改革带来的冲击导致国有企业崩溃,国企改革发端于授予国企管理自主权,然后转向国企制度变迁。更重要的是,与中国的比较优势相匹配的新企业和新行业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和鼓励。中国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就是一个绝佳的范例。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政府成功甄别经济增长和因势利导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他们克服了信息不对称、协调失灵,甚至是与市场机制相关联的外部性和适宜性(林毅夫,2012)。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也对创造就业和减少贫困发挥了显著成效。随着经济结构转型的推进,第一产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显著下降,第二产业的份额,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比重则明显上升。随着生产要素价格扭曲逐步得到修正,损害农民利益的不利贸易条件获得矫正。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给农民带来了更多赚取较高收入的就业机会。中国政府大力促进农村地区发展的措施也改善了基础设施硬件和软件。上述三个因素共同改善了中国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并显著降低了贫困人口数量。产业升级也提高了城镇地区工人们的生活水准。在遵循比较优势(CAF)的发展战略推动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快速发展,这反过来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中国国有企业的数量和产量已大为减少,但绩效表现明显改善,这得益于效率提升和激发了工人们的积极主动性。因此,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城市地区工人们的生活水准也得到提升。

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奇迹中学习借鉴两个要点。首先,为了成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采纳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的,遵循比较优势(CAF)的发展战略;其次,尽管存在一个自由、公正和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上发挥积极的作用。本文提供并探讨了用于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有用框架,并附带几条重要建议。

本文其余部分的组织架构如下:第二节介绍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前,国内制造业面临的诸多条件;第三节探讨中国经济腾飞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制造

业结构升级的趋势及特点;第四节审视诠释工业快速增长和经济结构升级的主要因素,如政策制定;第五节调查研究工业发展和制造业结构调整对创造就业岗位的影响,然后仔细审视制造业就业变迁与减贫之间的关系。基于中国的经验,第六节探讨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学习借鉴中国经验的要点;最后,第七节小结,并为中国未来的改革提供一些建议。

## 二、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经济状况

在1978年中国实施经济改革之前,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在1952年,农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高达57.7%,所吸纳的劳动者数量占中国受雇劳动力总数的83.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很低。尤其是,人均农业和工业产出为143元人民币(按1952年价格计算,相当于65美元)<sup>①</sup>。在经济改革之前,一个扭曲的产业结构遏制了中国经济发展,这反过来造就了一个闭关自守的经济,犹如深渊的贫困境况和扭曲的收入分配。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国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类似,中国在1949年获得政治独立后,领导人采纳了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然而,重工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行业,而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资本匮乏的农业国。要素禀赋和发展战略之间的巨大反差导致中国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与之相反,中国实施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是一个违背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 Defying, CAD)的战略,这扭曲了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且中国不得不依赖高度集权的计划性资源配置机制。中国政府被迫相应建立起类似傀儡的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中国经济改革前经济体系中的这三大要素被称为“传统经济体制的三位一体”(林毅夫等,2004)。

首先,为实施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中国政府不得不扭曲宏观经济政策,压低利率、汇率、工资薪酬、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的价格,甚至是农产品价格(林毅夫,2003)。建设重工业的众多项目需要大量资金,而当时中国资金

<sup>①</sup>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

匮乏。为了满足对资金的强烈需求,中国政府不得不控制利率以降低资金成本。此外,重工业还需要资金密集的中间产品和设备,而当时作为农业国的中国无法生产这些产品,从而需要从国外进口。因此,充足的外汇储备是重工业项目的先决条件。但是,中国的外汇也非常短缺,因为在经济改革之前,中国的出口商品仅限于自然资源和低附加值农产品。中国政府被迫高估本币兑美元的汇价以降低进口中间产品的成本。中国人民币汇价从1950年的每1美元兑换4.2元人民币升值为每1美元兑换1.7元人民币,在此期间汇率升值幅度达到250%。

为重工业积累资金的唯一途径是降低各类投入要素的成本。与压低利率相对应,中国政府也为城市职工设定了较低的名义工资。该工资薪酬与工人们的努力程度无关,但工资水平根据等级和资历而有所差别。在1978年之前,中国员工的平均年工资是550元人民币(按照1971年的汇率,相当于223美元)。人为压低的工资遏制了城市工人们的购买力。倘若农产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随行就市,城市工人们将没有能力消费大多数的上述产品。因此,中国政府不得不将农产品设定为很低的价格,以创造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价格剪刀差”的方式牺牲农民利益和贴补城市工人(林毅夫和余森杰,2009)。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实施了非常严格的住所控制制度(所谓的“户口”),以防止农村居民迁移至城镇地区来寻找工作岗位。该户籍控制制度自1958年起付诸实施。

其次,中国建立起高度集权的计划性资源配置机制。由于中国政府人为地扭曲很多产品和各类投入要素的价格,每个要素市场都出现了超额需求。因此,鉴于产品和各类投入要素的价格是固定的,一个基于市场供求的资源配置机制无法付诸实施。为了应对过多的需求,中国政府不得不借助一系列有计划的行政管理措施来定量供应各类资源。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的外贸体系。鉴于人民币汇率被人为调高,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外贸企业发现出口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但是,假若没有企业出口商品,有限的外汇储备将很快枯竭,从而中国将无法进口必要的设备和中间产品。为了避免这一局面,中国政府被迫通过设立对外贸易部的方式在外贸领域实施垄断,外贸部授

权 12 家全国性的专营外贸公司。这些外贸公司充当“气囊”(air-lock),将中国与世界经济隔离开来,并垄断了全国的对外贸易业务。此外,中国政府还设立中国人民银行以定量供应资金,并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管理各类原材料和自然资源。

最后,根据上述扭曲的制度安排,中国政府还采用了相应的微观经济管理体系。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建立起众多的国有企业,尽管在农村地区也建立了人民公社。投入要素和产出要素的价格扭曲旨在积累资金,这对于成功实施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倘若企业性质是私人所有,他们可以在企业所有者内部分配利润,这无法积累很多资金,从而恐将摧毁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因此,企业的所有制必须是国有的。此外,即便某一家国有企业被赋予经营自主权,由于企业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其工人们也会偏离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国家发展战略。因此,国家必须剥夺国有企业的任何经营自主权,并采纳类似傀儡的企业经营体制。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是通过人民公社来强制进行的,以确保国家能垄断农产品的采购和销售。这些措施被付诸实施,以进一步确保国家可积累足够资金用于发展重工业(林毅夫,1990)。

因此,中国建立起一个旨在支持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的经济体制。要素价格的扭曲使得企业能够降低投入品成本和赚取尽量多的利润,该利润反过来被用于积累资金。高度集权的、有计划的资源配置机制能确保有限的自然资源会源源不断地流向重工业,与之相对应,中国采用了一个类似傀儡的微观经济管理体系以促使此类安排变得顺畅合理和成功推行。

然而,如上所述,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是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因为中国在经济改革之前是一个资金极度匮乏的国家(林毅夫,2003)。一个违背比较优势的国家战略可能导致扭曲的产业结构,并恐将导致中国经济难以实现制造业结构升级。显然,违背比较优势原则的国家战略无法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并导致工人们过着低水平的生活。

有趣的是,这个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在多大程度上为后来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奠定了基础?由于 1978 年之前的相关数据有限,倘若有研究

报告,也少有研究报告为这一问题提供直接的答案。然而,正如研究报告 Hsieh-Klenow(2009)所发现的,即便在当今,中国要素市场仍有大量的,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所遗留的价格扭曲(林毅夫,2003)。倘若此类扭曲得到修正,中国制造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有望提升 25%以上。针对这个实证问题的答案远非确凿无疑。但是,我们仍能间接地捕捉到经济改革之前的价格扭曲。譬如,图 1 暗示在 1952 年至 1978 年期间,中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严重的畸形。中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占比显著上升,从 1952 年的 19.5%激增至 1978 年的 49.4%;与此同时,农业占比呈现下滑趋势,从 1952 年的 57.7%滑落至 1978 年的 32.8%。然而,同期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中的非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双双下滑,这表明制造业占比上升是以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中的非制造业,以及第三产业的萎缩为代价的。当然,就其本身而言,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和农业占比下降并非是显示产业结构扭曲的指标。然而,鉴于中国的人均 GDP 仍处于极低水平(按 1979 年汇率计算,相当于 243 美元),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偏高表明中国经济结构扭曲,这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证实。首先,在制造业内部,重工业的比重从 1952 年的 35.5%攀升至 1978 年的 56.9%;其次,制造业内部的投资分布也偏向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比例(即重工业投资额除以轻工业投资额)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 年至 1957 年)的 5.7 倍上升至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1971 年至 1975 年)的 8.5 倍。

鉴于重工业本身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该产业无法吸纳新增的劳动力。尽管重工业占 1978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四分之一,该行业吸纳的就业人口仅占全国的 7.9%。与之相反,由于轻工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通常可以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轻工业占 1978 年中国 GDP 的比重为 3%,但吸纳的受雇劳动力占全国的 4.6%。与此同时,在中国经济改革之前,超过 73%的劳动力仍从事农业活动。此外,由于“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导致农产品价格被人为压低,广大农民不能借助重工业的发展而增加收入。与之相对应,即便在中国实施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二十年后,中国仍处于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行列,1978 年人均 GDP 为 381 元人民币(按 1978 年汇率计